

西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内涵与价值研究

文丹

西安培华学院, 陕西西安, 中国

【摘要】文章以西安高质量发展为背景, 深入探讨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西安历史上著名名士雅集活动的分析, 揭示长安名士雅集活动在文学、艺术、社交等方面的独特价值, 为城市文化建设和文旅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。同时, 结合当下城市发展战略及当代社会发展需求, 从文化传承、经济推动、社会建设等维度, 揭示其在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、提升文化软实力进程中的重要作用, 为相关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城市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西安高质量发展; 长安名士雅集; 文化内涵; 价值体现

1. 引言

西安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 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, 西安积极推进文化与经济、社会的协同发展, 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。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作为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 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魅力, 在西安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化品牌。深入研究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内涵与价值, 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 推动西安文化产业繁荣发展,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。

西安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,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核心区域, 留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大雁塔、碑林博物馆、大明宫遗址等历史古迹, 以及丰富的诗词、书画、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, 构成了长安名士雅集活动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。这些资源为雅集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素材和独特的文化氛围。西安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, 需要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。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形式, 能够有效激活历史文化资源, 促进文化消费升级, 增强城市的文化标识度和国际影响力, 满足西安高质量发展对文化建设的需求。

2. 西安历史上著名的长安名士雅集活动

“雅集”是指古代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, 进行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聚会。那些赏心的雅事, 往往在雅集中得到尽情的、戏剧化的呈现。雅集文化如同一条贯穿中国历史的文脉, 从先秦的礼仪宴饮到唐宋的诗意栖居, 再到明清的文人雅趣, 始终承载着

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高度的追求。它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缩影, 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生活智慧——在“雅”的仪式中, 实现人与文化、自然的深度对话。古代名士雅集活动的风俗以及文学和艺术作品, 被后来人不断地推崇、效仿并发扬光大, 成为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, 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, 培养国人的文化自信, 起到积极的作用。[1]

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, 尤其是在汉唐时期作为都城长安, 曾孕育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名士雅集活动。这些雅集不仅是文人墨客的聚会, 更成为文化交融、思想碰撞的重要舞台,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印记。

2.1 汉代长安梁园雅集: 盛世中的文人雅集

汉代梁园雅集虽非直接位于长安, 却与长安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西汉时期, 梁孝王刘武在封国梁地(今河南商丘)营建梁园, 广纳天下贤士。而长安作为都城, 吸引了众多来自梁园的文人, 形成了文化辐射效应。司马相如、枚乘、邹阳等著名文人都曾往来于长安与梁园之间, 在长安也留下了类似雅集的文化活动痕迹。在长安的相关雅集活动中, 文人们以辞赋创作见长, 围绕宫廷生活、都城风貌、自然景观等主题展开创作。梁园雅集的文化传统对长安乃至整个汉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, 推动了汉赋的繁荣发展, 奠定了汉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和审美取向, 也为后世雅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。

2.2 长安曲江宴: 最具影响力的长安雅集

曲江宴是唐代科举制度下的重要文化活动, 因在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畔举行而得名。

每年新科进士放榜后，朝廷会在曲江池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宴会，成为当时长安最具影响力的名士雅集之一。

新科进士们在曲江宴上即兴赋诗，相互唱和。白居易、刘禹锡等著名诗人都曾参与其中，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。如白居易在《曲江宴后题》中写道：“曲江水暖花千树，有底忙时不肯来”，生动描绘了曲江宴的热闹场景和春日美景。除了诗歌创作，进士们还在宴会上交流学术思想、讨论时政热点，儒家、道家等不同思想在此碰撞融合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。曲江宴也是新科进士拓展社交网络的重要场合，他们与朝廷官员、文坛前辈互动交流，为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基础。

曲江宴不仅推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，还成为科举文化的重要象征，对后世的科举制度和 cultural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将文学创作、社交礼仪与政治生活相结合的模式，展现了唐代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2.3 长安乐游原雅集：民间雅集的美学范本

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进行文化、生活交往的风雅聚会。[2]乐游原位于长安城南，是唐代文人喜爱的聚会场所。这里地势较高，视野开阔，适合登高望远、吟诗作赋，因此成为长安名士雅集的重要地点之一。文人们在乐游原上登高远眺，面对壮丽的长安景色，抒发对人生、社会的感慨。李商隐的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便是在乐游原雅集中创作的，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对时代的思考相结合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。乐游原的自然景观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，他们通过描绘山水风光、季节变化，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感悟，形成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重要分支。

乐游原雅集延续了前代文人雅集的传统，同时又融入了唐代的文化特色，成为连接古今文化的重要纽带。乐游原雅集推动了唐代诗歌在情感表达和意境营造上的创新，丰富了唐诗的内涵和表现形式，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和审美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。[3]

2.4 长安杏园探花宴：名士风流的文化盛宴

杏园探花宴是唐代曲江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在长安杏园举行而得名。宴会上，新科进士中最年轻英俊的两人被选为“探花使”，负责采摘园中的鲜花，迎接状元，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文化盛事。探花宴是科举制度的生动体现，展现了唐代对人才的重视

和对科举成就的褒奖。新科进士们在宴会上身着华服，意气风发，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。除了诗歌创作，探花宴上还设有各种文化游戏，如“探花”“赋诗”“联句”等，将文学创作与娱乐活动相结合，增添了雅集的趣味性和互动性。

杏园探花宴不仅在文人阶层中具有重要影响，还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成为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。杏园探花宴进一步强化了科举制度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，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，同时也成为后世科举文化的重要象征，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和效仿。[4]

3. 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文化内涵

对雅集形式、活动内容的考察不仅能从一个侧面见出雅集活动主体——文人群体的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、社会风貌。[5]长安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名士雅集活动，极大地丰富了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底蘊，具体体现在它的文学艺术价值、社交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中。

3.1 文学艺术价值

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中的诗歌创作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既有对长安山水风光的赞美，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，已经成为西安这座“诗城”的文化符号。雅集活动为唐代诗歌提供了绝佳的创作场域，催生了大量传世名篇。在曲江宴中，新科进士们常以“即事命题”进行诗歌唱和，如白居易在《曲江宴后题》中写道：“曲江水暖花千树，有底忙时不肯来”，将宴饮欢娱与自然景致巧妙融合。而乐游原聚会则成为文人抒怀言志的舞台，李商隐的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便在登高望远的雅集情境中诞生，将个人心绪升华为对时代的哲思。这种集体创作氛围促使诗人在题材选择、语言锤炼上相互切磋，推动了唐诗在格律、意境上的全面成熟。

3.2 文学交流及批评体系的建立价值

长安雅集常伴随“题壁”行为，文人在曲江亭、乐游原亭榭的墙壁上题诗作文，形成独特的“公共文学空间”。李白“曲江池畔杏园东，下马先寻题壁诗”的描述，揭示了题壁文学作为雅集延伸的社交属性——文人通过壁上诗文进行跨时空对话，既展示个人才学，又构建文学声誉。这

种创作形式打破了传统书面文学的私密传播模式，使文学成为公共文化景观的一部分。雅集活动中，文人常对彼此作品进行即时点评，形成动态的文学批评机制。[6]如《云仙杂记》记载，王维在雅集中以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诗句受众人称赞，这种现场反馈促使诗人不断精进技艺。而王昌龄、王之涣、高适在旗亭的“诗赌”故事，更体现了雅集作为文学竞技场的功能，通过公开评比推动创作水平的整体提高。

雅集活动产生的大量作品通过文集编纂得以保存和传播。如《曲江宴诗集》收录了新科进士在宴会上的诗作，成为研究唐代科举文化的重要文献；《河岳英灵集》则选录了盛唐诗人在雅集中的代表作，通过编者殷璠的评语，构建了“风骨”“兴象”等文学批评标准。这些文集的编纂不仅保存了文学遗产，更通过筛选和评价，参与了唐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。

3.3 文学传承的价值

一是审美范式的典范意义。长安雅集形成的“情景交融”“文质彬彬”的审美追求，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范式。宋代文人效仿唐代曲江宴，举办“琼林宴”雅集，苏轼在《琼林宴恭和御制》中延续了唐代雅集诗的庄重风格；明代文人在南京秦淮河畔的雅集，更以唐人为楷模，追求“诗酒风流”的文化理想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审美传承，使长安雅集的文学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。

二是社交与文学的双重功能。雅集活动将文学创作与社交礼仪完美结合的模式，为后世提供了典范。[7]从宋代的“西园雅集”到清代的“江村雅集”，文人始终延续着“以文会友”的传统，将文学作为构建社会网络、表达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。这种功能不仅体现在政治精英的交往中，也渗透到市民文化层面，如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诗社活动，便是对长安雅集传统的文学化演绎。

三是文化记忆的建构与重塑。长安雅集作为文学符号，不断被后世文人重新诠释。刘禹锡在《乌衣巷》中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感慨，将东晋名士雅集与唐代长安的文化记忆相勾连；元曲作家白朴在《梧桐雨》中通过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曲江雅集，赋予历史事件以文学想象。这种持续的诠释与重塑，使长安雅集超

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，成为中国文学中象征文化鼎盛的集体记忆。[8]

4. 西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实践价值

在西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，文化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传承与创新成为关键。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作为唐代文化的精髓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实践智慧。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载体，重新审视和激活这一传统雅集形式，对于西安的文化建设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多维度的实践价值。

4.1 推动城市文化建设

唤醒历史文化基因，构建城市精神标识。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以“诗歌唱和、书画创作、琴棋雅玩”为核心内容，通过在大唐不夜城复现“曲江宴饮”“乐游原吟诵”等历史场景，将唐代文人“以文会友、以雅兴邦”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体验。例如，定期举办的“唐风雅集”活动中，参与者身着唐装参与诗歌接龙、碑刻临摹等环节，在仿唐建筑与数字化光影的交织中，实现对“李白醉草吓蛮书”“王维画中有诗”等历史场景的沉浸式还原。这种实践不仅激活了《全唐诗》《唐六典》等文献记载的文化记忆，更通过“非遗手作体验”“唐乐复原演出”等形式，让千年之前的文化基因在当代城市空间中焕发新生，逐步构建起以“盛唐气象”为标识的城市精神内核。

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，拓展文化表达边界。[9]雅集活动的现代实践突破了传统形式的局限，通过“科技+文化”的融合模式实现创新发展。打造文化传播矩阵，增强城市文化辐射力。以雅集活动为核心，大唐不夜城构建了“线上+线下”“体验+传播”的立体文化传播体系。线下通过打造“雅集主题街区”，设置“诗碑步道”“书画工坊”等互动装置，形成可触摸的文化体验空间；线上开发“长安雅集”小程序，用户可参与虚拟雅集、生成专属诗词海报，实现文化内容的社交裂变传播[10]。

4.2 社会治理与城市发展的促进价值

一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，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。长安名士雅集活动打破了传统文化服务的时空限制，通过“普惠性+精准化”的服务模式满足市民需求。在大唐不夜城设置的“全民雅集角”，每周免费

举办书法、茶道等体验活动。这种多元化的服务供给，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。

二是雅集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大唐不夜城及周边区域的城市空间优化。通过改造老旧厂房为“雅集艺术中心”、将闲置广场转化为“诗词主题公园”，实现了城市存量空间的活化利用；在建筑设计中融入唐代斗拱、彩绘等元素，使现代商业空间与历史文化风貌有机融合。

在西安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，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现代实践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更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。它通过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激活城市精神内核，借助产业融合培育经济新动能，以多元共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，用生态文化理念引领可持续发展，为西安建设“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”提供了全方位的价值支撑。未来，随着雅集活动形式的不断创新与内涵的持续深化，其将在西安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深远的作用，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城市典范。

5.结论

长安名士雅集活动作为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文学、艺术、社交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。在西安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，深入研究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内涵与借鉴意义，对于推动城市文化建设、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通过加强对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研究和保护、定期举办名士雅集活动、有序开发名士雅集活动

产品和旅游项目、加强宣传和推广等策略，扩大长安名士雅集活动的影响力，为西安的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曾招喜.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济南名士雅集活动的内涵与价值研究[J].济南职业学院学报, 2025年, 1卷(期): 105-112.
- [2]朱怡雯.白居易佛寺结社对文人雅集传统的开拓[J].法音, 2025年, 1卷: 47-51.
- [3]郭明皓.园林宴游雅集与文人精神的形塑[J].东方丛刊, 2024年, 1卷: 227-245.
- [4]刘馨蔚.从《杏园雅集图》看明代文人活动[J].艺术研究, 2024年, 4卷: 44-46.
- [5]赵旭.唐代长安文人雅集研究[D].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 2016年.
- [6]李怡.魏晋宴会雅集中魏晋文人风度的迁流论文题名[J].现代语文, 2015年, 6卷(期): 8-9.
- [7]赵爽.从玉山雅集看元末文人对桃源思想的继承与突破[J].美与时代(下), 2024年, 8卷: 110-114.
- [8]李宗远.宋代园林图像中临水建筑的文化意象及其营造特征研究[D].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 2024年.
- [9]叶子懿.雅集及其艺术空间的现代转变[J].荣宝斋, 2024年, 9卷: 100-109.
- [10]刘自歆.《兰亭集序》的名士文化意义[J].学语文, 2016年, 6卷(期): 71-73.